

被误读的茅盾：批评的错位与评价的失衡

——置于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分析

王嘉良^①

摘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的评价，在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形成独特的创作“模式”等方面，存在着种种“误读”现象，便有可能造成对作家评价的失衡。这里的确存在着许多复杂现象，只有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分析，才能作出准确估价，从而达到作家固有价值价值的还原。

关键词：茅盾评价；误读；文化语境；个体特色

作者简介：王嘉良，男，教授。（浙江师范大学 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4-0095-07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新世纪头十年，甚至再倒回去看：从20世纪30年代以厚重的《子夜》等作品称雄新文坛以来，茅盾一直享受的是“一流”作家的礼遇，获得的是“新文学旗帜性人物”之一的赞誉，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其受到读者、评论者和研究者的好评也大大超越其他现代作家，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其的“历史性评价”之高，当然也非除鲁迅之外的其他作家所能比拟。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以来，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作家被重新评估，特别是对曾长时期主宰中国新文学潮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多持异议，对茅盾的研究与评价也发生严重倾斜。从那时起，茅盾研究已从高端跌入低谷：不但研究数量锐减，而且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大幅度转弯，以往的超一流定位，此时已受到质疑，对其的批评则多有所见，明显的例证是将其列为“重写文学史”的首批重评对象^②；直至90年代初期的“20世纪十大小说家”排名，主事者将茅盾革出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十强”行列，使其由位列“三甲”到走不进小说家前十位置，一举推翻此前数十年几乎已有“定评”的排位。

笔者以为，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巨大落差，并由此及于当下茅盾研究的冷落，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而言，一个曾对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一个曾以厚重著作做世的新文学代表人物，一股一度左右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强劲文学潮流的推助者，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对茅盾这样重要研究对象的“缺席”和对其作出的轻率评判，并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茅盾做科学的历史评价，将其置于中国20世纪复杂文化语境中的审视与分析，至关重要。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 以往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强烈反差，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偏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研究”（11BZW086）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嘉良，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茅盾小说论》。

^②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于1988年由《上海文论》提出，被首批重评的作家有茅盾、丁玲、赵树理、柳青等，他们都属于建国后在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现实主义作家。

历史文化语境，割裂历史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问题和学术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对茅盾这样的作家的评价，打破“习以为常的定论”，必须破除“政治和学术上的种种偏见”，或者欲以“纯文学的标准”或“审美标准”重新审视作家。这样的要求诚然是合理的，已有的“定论”缺乏历史合理性，必须予以打破，也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问题是：离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评论作家，尤其是在面对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作出合理评估，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偏离历史文化语境，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事实上已存在对茅盾和“茅盾现象”的几种误读，笔者以为，下述几种是较有代表性的。

一、“误读”之一：作家评价的单一政治阐释

对茅盾的科学评价，着眼于中国20世纪文化的复杂性，着眼于由“矛盾”人生构成的复杂茅盾“个体”的认知，看待其在中国特定政治文化中的文学路径选择，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以往的对茅盾的“误读”，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评价的单一政治阐释，并将此推向极端，只以“政治”为标识，品评其思想与创作，于是便产生以政治的起伏确定对作家的评价：政治文化高扬时，茅盾有很高的地位，反之则一落千丈。对《子夜》的评价是一个典型例证：当政治主宰一切时，阐释这个文本的价值强调的就是那个揭示中国社会性质的政治性主题，其重要艺术价值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一旦主流话语发生变异，那个政治性主题不再被强调时，茅盾的这部作品（甚至包括其构筑的整个艺术大厦）就会在人们心目中动摇，而认为茅盾的创作仅以政治理念取胜的评论则会大行其是。这种因“政治上的偏见”所导致的“学术上的偏见”，将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复杂的作家“个体”作简单化处理，离开科学评价相去甚远是势所必然。至少下述两种单一政治阐释的偏向是有待纠正的。

一种偏向是作家身份的单一政治认同。毋庸讳言，基于茅盾独特的文化接受和人生道路选择，他的确是政治色彩浓厚、政治身份鲜明的中国现代作家。通常对茅盾形象的描述，是革命家、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三位一体，这是大致不错的，然而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也可作同样的描述（如鲁迅、郭沫若等），非独以茅盾为然，这说明：文学与政治结缘，作家显出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倾向，甚至承担多种社会角色，恰恰是特定文化语境中中国作家的一种独特构成。中国20世纪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动态结构：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转型，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变革，在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转化。在这错杂的情势面前，一切文化人都需要经受检验而决定其取舍，其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无不受制于此。作家与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产生内在关联，几乎无可避免。另一方面还须看到，20世纪的中国文化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化积淀，都有各自对现实政治的独特参与方式，其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审视，以及长期知识积累所形成的一整套观念系统，总是显出独立判断和不随流俗的一面；而中国20世纪文化的动态结构又使他们的观念处于非恒定状态中，常常因现实情势的转换而有所转换，于是就有所谓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化人”自身的复杂性。以此看待茅盾，既注意到其与中国政治文化无法回避的关联性，又审察其充满“矛盾”的人生及其文化思想、文学选择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就能获得对作家“个体”的真切认知。在中国20世纪变幻莫测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上，茅盾的文学选择并不单一，而是显出丰富内涵与斑斓色彩。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茅盾其人及其构筑的文本世界，“并不像有人说的是简而明的理性图式，它的整体艺术风貌是特异与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不同的情绪和心态交混在一起，人生的复杂和人心的深度交融在一起。”^[2]如此复杂样态，岂是一个“政治化”的茅盾所能涵盖的？茅盾研究中作家身份的单一政治认同，似乎是讳言政治的，不能容忍作家与政治发生关联，或是离开作家“个体”的独异性，评述其政治身份和政治色彩，其实恰恰是一种“政治和学术上的偏见”。

另一种偏向，是多重文化思想的单一政治参照。科学评价现代作家的文化或文学思想及其文学创

作的政治文化内涵，努力避免对中国20世纪文化复杂政治内涵的单一性理解，也很有必要。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是在于：由于其交织着历史、现实、社会、民族、阶级、阶层、政治、经济等诸多复杂因素，便会呈现出人们对其复杂状况认知的差异，因而，对作家政治文化观念的科学描述与评价，就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看其用独有的政治文化视角阐释政治的态度与方式，从而对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政治文化蕴含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这里，重要的是避免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评说政治文化。以往的茅盾研究，以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品评其创作的社会政治蕴含，就会导致对问题的狭隘理解。例如对《子夜》政治性主题的强调，就是用“制度”、“道路”之类带有非常强烈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阐释，势必影响人们对这个作品深层价值意义的发掘。如果换一种评论视角，即按照阿尔蒙德所指出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观点，^[3]去阐释茅盾创作的政治文化蕴含，就不难理解政治文化确实有丰富的内涵，对茅盾作品的解读也应有更拓展性的认识。作为政治意识较为强烈的作家，茅盾堪称是典型的“特定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文学表达者。其创作表达的政治文化意义，便是有效运用了他在长期社会实践和知识积累中形成的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独特理解，不但有“阶级政治”的阐释，更大量的是“民族政治”阐释，以表现“本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和一个“特定时期”的民族政治内涵，从而显出创作蕴含了多重政治文化意义。《子夜》是个范例，尽管小说叙事也关乎主义、道路之类的政治性命题，但细察作品的深层内核，探讨的其实是国家、民族命题，即透过民族资本家艰难命运的描写，联系着他一以贯之的关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大主题的思索。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论述^①，此处不赘。这里只想指出的是，倘若能按并不单一的政治文化观念去理解，就不会作出茅盾的政治叙事过于褊狭的评判，也不至于产生更多的误读和误评。现在看来，纠正茅盾创作评论的政治偏见，对政治阐释视角作调整实在是必不可少。

二、“误读”之二：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错位

对茅盾创作评价的错位，不可忽视的是有着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发生整体变异的背景：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大量输入，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被解体，被人们视为与现实无涉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过重现实意义、“社会负担”的现实主义创作则无法与之比拟，这便注定了对茅盾的评价会出现重大反差。因为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茅盾作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角色定位，其本人长时期“独尊”现实主义，于是对茅盾的评价就因现实主义命运的起落不定而发生变异：当现实主义地位坚挺时，茅盾被尊为现实主义大师，就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随着新时期文学多元化的来临，现实主义独尊地位的解体，对茅盾的评价即随之发生倾斜，使其成为“重写文学史”首先发难的对象。

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错位，集中反映在不同文学思潮价值观念的认知差异。反观人们对茅盾创作欠缺艺术价值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坚守现实主义文学观。例如其创作理论中，主张凸显文学的现实要求与社会功能，甚至主张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主张；如果用其他文学思潮理念去评价它，也许就会被低估了价值。许多研究者不能容忍茅盾创作过重的“社会要求”，诸如作品表现现实关系、政治经济关系等，不能容忍其习惯于用理性分析把握文学创作，就在于偏离现实主义的特定命题范围讨论文学问题：凡是社会要求、“社会负担”都与“文学”无关，于是坚持“社会化”的现实主义创作便注定与艺术无缘，也与文学无缘。这样的评论，以单一的文学观念评

^① 参见笔者：《茅盾小说：政治叙事的两重视角与效应》，《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说不同文学思潮,尤其是离开复杂文化语境评论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其存在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诚然,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本身并非毫无可议之处,其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独尊”现实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学思潮,也有不少弊端,但终究由于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积淀了较深的艺术体验,必然有其对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独特建树。就理论而言,茅盾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现实主义理论作过深究而又有自己独特见地的少数作家之一,就像他曾颇为自信地说过:“对于布尔乔亚的文学理论,我曾经有过相当的研究。”^[4]由是遂有其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切把握;就创作而言,茅盾大体上遵循的是具有“创造原点”价值的现实主义,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所说:他“所用的是欧洲正宗的现实主义方法”,“也可以说他是将欧洲古典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运用于本国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5]这就有可能使其创作能驾驭较为本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取得不同程度的艺术成就,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欠缺艺术价值的。

审视茅盾对现实主义的执著坚守,考量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需求,同样见出历史合理性。尽管20世纪世界文学已呈多元并存格局,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文学思潮互争雄长,但现实主义依然有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有着“特别国情”的中国,它一直居于“主潮”地位。正因此故,日本学者筱田一士排出“世界20世纪十大小说”,中国作家茅盾的《子夜》赫然在列,并认为就现实主义而论,茅盾“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可谓最杰出的存在”。^[6]此说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事实上,茅盾本人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就有文学与文化思潮切合性的论述: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主潮”地位毋庸置疑,“中国新文学20年来所走的路,是现实主义的路”;尽管其间因剧烈的社会变动,在文学上曾产生各种各样的“主义”,但不幸都“被时代遗忘了”,“现实主义屹然始终为主潮”。^[7]只要不抱有偏见,不难论定这样的论述思路并没有偏离中国新文学实际。而且,茅盾的现实主义选择并非带有随意性,而是在对各种文学思潮作反复的比较、筛选以后做出的,经历了审慎提倡写实主义、集中倡导自然主义、专力批判新写实主义、最终确立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演进历程。这说明,他的现实主义选择是严肃审慎的,是一种基于“现实”需求的理论自觉,亦显示出其现实主义文学观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其中包括吸收多种文学思潮的合理内核,对其采取单一化、极端化的评论并不可取。因为离开历史文化语境来谈论现实主义的是非功过,离开作家的整体文学思想评说其现实主义创作,毕竟并不科学。这一点也足以提醒人们:不但是对茅盾的评价,即便是对整个新文学创作的评论,都必须有对坚持现实主义必要性及其独特价值的确切认知。

三、“误读”之三:“纯文学标准”的评价失实

由于对政治介入的过度阐释,以及政治阐释视角的偏差,与之相伴的另一种误读,是对茅盾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欠缺艺术性或审美价值的批评。政治与艺术,从来都是作家评论中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当评说一个作家政治色彩过分浓厚时,实际上意味着对其创作忽视艺术要求的批评,因为过于看重创作的社会要求和政治要求,其作品的艺术要求和艺术含量必然受损;反之亦然:当一个作家淡薄政治,专心致志于“纯文学”或“纯艺术”的追求,也意味着其创作的艺术价值比较高。这种对政治与艺术的简单化理解,当然并不是对艺术问题的准确阐释,而此种惯性思维,在当下的茅盾评论中却有突出表征。有研究者提出,欲破除茅盾研究中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偏见”,重要的是用“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作家,似乎茅盾是经不起“艺术分析”的作家,一旦用上“纯文学标准”,其作品价值不高的评判就不在话下。正是此种观念的流行,随意轻薄茅盾艺术功力的评说就时有所见。李洁非《寂寞茅盾》一文指出,^[8]一位颇有些影响的青年作家为逞一时口舌之快,对这位有着深厚艺术积累、素来被人们尊为文学“泰斗”、“大师”的作家,竟至于有了“文笔很差”、其作品“不能读下去”的说头,不免令人瞠目。“纯文学”观念的流行,对茅盾创作艺术分析的欠缺,很容易导致人们对一个作出重要

艺术建树作家的评价出现重大反差。

对茅盾艺术评价的失实，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纯文学标准”的评价错位。文学创作中是否有一种与社会现实无涉，只作纯然艺术表达的所谓“纯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在中国20世纪复杂文化语境中，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纷争贯穿始终，试图过滤出一种与此复杂文化环境毫不相干的“纯文学”，更是不可思议。正因此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中，主张以“纯文学标准”评价作家，一般不容易为人们接受，此说也不甚流行。近年来，“纯文学”观念一度被看好，有各种复杂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现实主义文学与所谓“纯文学”的评价错位。“纯文学”观念是排斥理性思维的，这恰恰与注重理性分析、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主张相对立，评论尺度的“位移”必导致评价的失误。有研究者断言茅盾主张的现实主义，是“以社会分析的理论体系”驾驭创作，就难以避免创作的“概念化”。如此简单化、随意性的评述，怎会对一种有着丰富内涵的坚持“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创作作出切中肯綮的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对茅盾创作的批评，产生“纯文学标准”的评价错位，不只是现实主义评价的分歧，还源于长期以来对茅盾深厚的艺术积累及其创作中充足艺术含量评论的欠缺。在一些评论者看来，一个有着极强的政治意识的作家，其对创作的艺术要求总是有所忽视的，这便有可能忽略了对其创作蕴含艺术价值的评价；而过分强调社会学批评，由于评论所重在创作的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的揭示，却将艺术批评置于并不重要的位置，也会有意无意地缺乏对作家艺术价值的估量。这两种评论方式，都有可能造成评价作家的偏差。这里就包含两个方面的认知误区：即对茅盾作为一个有着深厚艺术积累的“文学家”的认识不足，与对茅盾创作具有丰富艺术含量的评论有着欠缺。

在中国20世纪文化语境中，身处政治与艺术反复角逐、缠斗的复杂文学环境，茅盾曾担负多种身份角色，但“文学家”的角色定位始终不变，也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源于茅盾对文学事业的热忱与钟情，以及在长期文学实践中的丰厚积淀和对文学规律认知的日渐加深，于是就有了其对文学创作的不变选择，也有了其作为“文人”遵循艺术规律从事文学创作的应有态度。这一点，只要是不抱有偏见，并不难理解。茅盾是作为一位卓有成效的小说大家凸显于现代中国文坛的，他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成熟所作的创造性贡献，他为中国现实主义小说所提供的丰富创作经验等，已为许多研究者所论证，无需再细加评说。即使最为人们诟病的坚持“理性化”的艺术思维特征，也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对于艺术生成的复杂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创作中即便有浓重的理性介入，也总是尽力防范理性与艺术的“相生相克”，其中最重要的表征是他“以人物为本位”的理念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从而使其作品总是以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取胜。

作家在驾驭笔下的人物时，善于把握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与情感，从而把人的生理的、心灵的、精神的多方面需求表现俱足。这使其“理性化”蕴含了多重艺术质素：诸如隐伏其中的“诗性智慧”，借助于“十分发达的想象力”显出形象思维的活跃性，理智与情感交融所产生的“诗情观念”等，都能产生撞击人心的力量。所有这些，只要不是从既定的理念出发，而是能对作品作切实的而不是浮泛的分析与解读，应该不难取得共识。对茅盾创作欠缺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批评启示我们：茅盾研究的深化，必须走出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思路，必须有对茅盾创作艺术的更全面更扎实的分析与研究。

四、“误读”之四：单向思维模式与作家评价的失衡

对茅盾的评价出现重大反差，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首先提出重新评价的，是围绕“《子夜》模式”的讨论而展开的批评。许多研究者对茅盾始于《子夜》的“艺术模式”提出不同的批评视角，从而有了对“模式”的诸多质疑，这或有助于问题的讨论；但一种趋于极端化的批评，却是对模式的完全否定，诸如断言《子夜》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

试”；^[9]不但“《子夜》是一部失败的艺术品”，说农村三部曲“是失败之作也不为过分”等等。^[10]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子夜》一部作品，还包括茅盾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创作，于是就有了对一种所谓“创作模式”的批评，而且几乎使用了茅盾完全不够“文学家”资格的语言给予了完全否定。如此批评的误导性在于：茅盾的以《子夜》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作品，是其创作成就最高的部分，《子夜》等作品所积累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探索，也是其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的最丰富最完整的艺术经验，如果将此轻率否定了，则何论其创作价值，何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看来，对茅盾“创作模式”的准确评价，确乎是科学品评茅盾的关键节点，因而对这一问题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就以往产生的对茅盾的“误读”情况看，重要的是要避免评论作家的单向思维模式。

所谓单向思维模式，就是用单一的文学观念，对一种颇具复杂性与特异性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模式”只作简单化的理解与阐释。茅盾的“创作模式”有特指的意义范畴，它通常是指坚持社会科学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与渗透，展开对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的大规模的描写，在透视“社会”中特别重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表现与研究等。这使其创作显出特异性与复杂性，其特异性，甚至在一般现实主义创作中都是相当独特的。这说明，茅盾模式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提示我们对他的评价，必须有对模式本身复杂状况的切实分析，需要有从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现实发展需求等方面入手的深入理论探究，只作简单的肯定、否定文章并不能说明问题，而用单一的排斥理性介入、忽视文学社会功能的所谓“纯文学”观念去解释，则肯定会导致误读。事实上，茅盾的创作模式尽管独特，艺术上也非臻于至善，但从总体看，却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需求，创作方法上也没有违背现实主义艺术规律，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为理性思维介入文学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因此评价模式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是需要加以澄清的。细察当年人们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种种评论，并非都是判决式的批评，确实也有许多进行认真的学理性探究的文章，透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提出了对一种创作模式的不同批评视角，有些观点还颇为尖锐，这对于准确评价“模式”的意义（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极为有益的。由此也说明，对于一种有着复杂内涵的创作“模式”的理解，有许多问题的确有必要再予深入的探讨。

单向思维模式的另一种表征，是片面夸大“模式”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以“模式化”的思维品评作家的所有创作。就以往的许多评论看，“模式化”思维的重要表征，是抛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抽象出一种“纯粹”的创作模式，它同文学自身的演化毫无关联，而“模式”可能存在的“弱点”被无限放大，则此种模式就变得一文不值；或者是将作家的创作陷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中，是从“模式”出发（而不是从创作文本出发）解读作品，把一部有丰富内涵的作品（例如《子夜》）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而实际的创作活动却要复杂得多。于是就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究。例如“模式”中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是否就意味着这是一条一成不变的铁则，这注定使其成为茅盾创作中的主要艺术“失足点”？茅盾提出了一种创作“模式”，是否就可以将其全部创作“模式化”？前者的推论是缺乏对茅盾创作艺术多样性的把握，茅盾为文学提供的是一个多样的艺术世界，丰富的中外创作艺术的有效借鉴，多种创作方法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必造就其艺术方法的多样性和作品形态的多样性，决定其在创作中不会只固守一种艺术要求和创作特点。这只要认真审视其多种类型的创作，并不难得到合理解释。后者的“模式化”思维，同样欠缺对茅盾创作复杂性的理解。他在《子夜》等作品中形成一种带有“模式”性的创作特点，却不能以此评说其所有创作，原因是在于其创作特征（或曰创作模式）；此种“模式”在一个特定阶段中形成，却不能涵盖所有创作阶段。比如《子夜》与前期的《蚀》表现方法很不相同，即使与后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比较，也明显存在着创作范式的差异，如果将其“一锅煮”，必不可能对各种具有丰富复杂内涵的作品给予准确的辨析与阐释。作家评价的“模式化”思维之病就在于，对模式的理解过于简单与狭隘，没有深究创作的具体性与复杂性，就难以避

免评论出现偏差。

综上，若是缺乏对复杂文化现象的深入细致分析，只以浮浅认识去看待茅盾个体的独特呈现方式，必然造成对茅盾的种种误读，由此不难理解避免简单思维，对颇具复杂性的茅盾现象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估，有多么重要。这里，重要的是必须有将复杂的文化和文学问题放置在中国20世纪复杂文化语境中的分析，同时又需要有对茅盾“个体”独特性的深入认知。从这两个方面考量，涉及茅盾的人生历程及其思想复杂性的主要问题有：追溯其产生思想开阔性与复杂性的独特文化背景、他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矛盾”人生显现出何种丰富复杂的内涵、他以“文人从政”心态参与政治显出何种独特的展现方式；涉及茅盾文学创作评价的重要话题有：创作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长期持守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选择、对其“创作模式”的审视与评价、其“理性化”创作与独特艺术诉求的合理评析等。对于这一系列相关学术问题，本文只作了粗浅的论析，还有待作出更详实、深入的论证，从而使研究凸显出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因为以茅盾为个案，阐述其文化思想，实际上也昭示着中国20世纪文化思想的复杂性，所论也就不乏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从“茅盾本体”的几个重要侧面对茅盾的文学成就及其价值取向进行评述，虽然不能穷尽对茅盾的认知，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由对茅盾的深入思考，涉及与此相关的文学史问题，必定会从历史的审视中获得比单个作家研究更多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列宁. 论民族自决权 [A]. 列宁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12.
- [2] 朱德发. 茅盾研究的思索 [A]. 吴福辉, 李频. 茅盾研究与我 [C].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12.
- [3] [美] 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 [M]. 曹沛霖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9.
- [4] 茅盾. 答国际文学社问 [A]. 茅盾全集 (第20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3.
- [5] 李岫. 茅盾研究在国外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736; 625.
- [6] [日] 是永骏. 茅盾小说文体与20世纪现实主义 [J]. 文学评论, 1989 (4).
- [7] 茅盾. 现实主义的道路 (1941年2月) [A]. 茅盾全集 (第22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71-173.
- [8] 李洁非. 寂寞茅盾 [J]. 领导文萃, 2012 (24).
- [9] 蓝棣之. 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J]. 上海文论, 1989 (3).
- [10] 徐循华. 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9 (1).